

“战争之后——欧洲的复兴”

哲学家J. 哈贝马斯和J. 德里达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就未来的欧洲外交政策发表文章进行讨论。《明镜在线》摘要发表了这一文章。——译者

〔德〕 J. 哈贝马斯 J. 德里达/文 李 理/译

有两个日子我们不应忘记：一个日子是那一天：在那一天，各家报纸告知其惊诧不已的读者们，西班牙总理背着欧盟其他同伴邀请了那些愿意打仗的欧洲政府向布什表忠心；另一个日子是2003年2月15日，在这一天，游行示威的群众在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柏林和巴黎对这一突然袭击作出了反应。回过头来看，这些动人心魄的、自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游行的同时发生可以作为欧洲公共领域形成的信号而被载入史册。

毫无疑问，感情的力量使欧洲人民一起振奋起来了。但是同时，战争使欧洲人意识到了他们共同的外交政策早已显示出的失败。就像在全世界一样，这种对国际法的毫无顾忌的破坏也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争论。但是，分歧的论据更给了我们深深的一击。由于这一争论，众所周知的裂痕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对超级大国的作用、未来的世界秩序、国际法和联合国的重要性的分歧态度使潜在的矛盾公开爆发了。

在布鲁塞尔的宪法大会上，也表现出了那些真正想要加强欧盟的国家与那些对冻结现存的政府间统治的模式，或至多对其加以整容式改变具有可以理解的兴趣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现在这一矛盾不再能掩盖了。

未来的宪法将给我们带来一位欧洲的外交部长。但是，当各国政府不能就一种共同的政策达成一致的时候，一个新的职位会有什么用呢？

暂时，大概只有核心欧洲的成员国准备赋予欧盟以一定的国家品质。如果只有这些国家能够就“自己的利益”的定义达成一致，那该怎么办呢？如果欧洲不应当瓦解的话，这些国家现在就必须在尼斯通过的“加强合作”的机制，用以在“不同速度的欧洲”开始一种共同的外交、安全和防御政策。从中会产生出一种吸引力的作用，其他成员——首先是欧洲区域的成

员将无法长期摆脱这种吸引力的作用。在未来的欧洲宪法的框架中不可以也不能够有分裂主义。

走在前面并不意味着排除别人。先锋式的核心欧洲不可以固定为一个小欧洲；它必须

成为火车头，就像它经常所做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尖锐地集中在对战争与和平的愚蠢而又昂贵的选择上是不值得的。欧洲

必须运用它在国际层面上和联合国范围内的影响，用以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霸权。在世界经济

首脑会议上和在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中，欧洲应当在策划

制定未来的世界内政时发挥自己的作用。人们很容易就没有约束力的东西达成一致。我们所有人的眼前都浮现着一幅和平的、合作的、向其他文化开放的和有对话能力的欧洲图景。我们向在20世纪下半叶找到了两个问题的

示范性答案的欧洲致意。今天，欧盟已经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进行统治”的形式，这

可以在后民族的形势下被仿效了。欧洲的福利制度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模范的。今天，这种

制度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已经陷入守势。但是，在取消了边界的区域内，一种控制资本主义

的未来政策也不能倒退到这种制度所设的社会公正的准则后面。在已经解决了这一级的

两个问题后，欧洲为什么不应当也接受新的挑战，在国际法的基础上，针对具有竞争性的设

想，为一种世界主义的制度进行辩护并促进它呢？

今天的欧洲是通过20世纪的极权主义政体的经验和通过大屠杀——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和消

灭——来描绘的，纳粹政权也把被占领国的社会卷入了这种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消灭。对这一过

去的自我批评式的争论使人回忆起政治的道德基础。人们对个人的和肉体的完整性的伤害提高了敏感性，这首先

反映在，欧洲委员会和欧盟提出了把放弃死刑作为加入的条件。

随着与帝国主义统治和殖民历史的距离的拉大，欧洲强国也得到了机会，对自己保持一种反

思的距离。这样它们就能够学会，从被战胜国的角度来感受自己的胜利者的可疑角色，这些

胜利者要被追究用强力强迫进行使人失去根基的现代化的责任。这可能促进了抛弃欧洲中心主义

并加速了康德的那种对世界内政希望的实现。

（全文原载《法兰克福汇报》周六版，2003年5月31日）

[回主页](#)